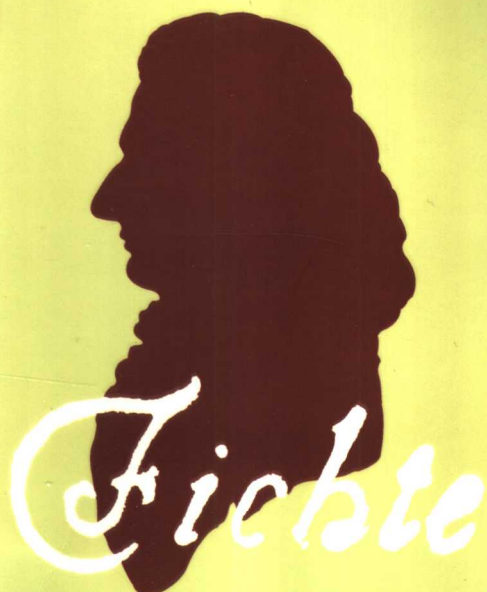




# 费希特在 当代各国

沈真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费希特在 当代各国

沈真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希特在当代各国/沈真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04-5679-4

I. 费… II. 沈… III. 费希特, J. G. (1762 ~ 1814)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1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169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a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2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绪言：费希特的复兴 ..... 沈 真 ( 1 )

回顾与展望

——1995 年那不勒斯国际费希特会议

闭幕词 ..... [德] R. 劳特 ( 6 )

费希特哲学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 [德] M. 布尔 ( 17 )

## 费希特在德国

慕尼黑学派的先验哲学 ..... [德] R. 劳特 ( 35 )

费希特著作编辑出版概况 ..... [德] W. 亨克曼 ( 66 )

《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评介 ..... 梁志学 郭大为 ( 78 )

书目 ..... ( 83 )

## 费希特在法国

费希特政治哲学在法国 ..... [法] M. 埃斯庞热 ( 97 )

法国现今的费希特研究 ..... [瑞士] I. 拉德黎查尼 ( 109 )

费希特的创造性想象力理论 ..... [法] A. 费洛年柯 ( 117 )

书目 ..... ( 133 )

## 费希特在意大利

意大利现代的费希特研究 ..... [意] M. 伊瓦尔多 ( 137 )

|                 |                 |
|-----------------|-----------------|
| “设定”的双重意义 ..... | [意] C. 切萨 (144) |
| 书目 .....        | (156)           |

### 费希特在北美

|                    |                       |
|--------------------|-----------------------|
| 当代费希特研究在北美 .....   | [美] D. 布雷齐尔 (161)     |
| 费希特今日何以得复兴? .....  | [美] D. 布雷齐尔 (171)     |
| 《自然法权基础》英译本序 ..... | [美] Ch. M. 希罗维尔 (182) |
| 书目 .....           | (190)                 |

### 费希特在俄国

|                |                  |
|----------------|------------------|
| 费希特在俄国 .....   | 沈 真 (195)        |
| 费希特的晚期哲学 ..... | [俄] П. 盖坚科 (205) |
| 书目 .....       | (235)            |

### 费希特在日本

|                   |                |
|-------------------|----------------|
| 费希特在日本 .....      | [日] 隈元忠敬 (241) |
| 存在的意识             |                |
| ——费希特后期思想研究 ..... | [日] 隈元忠敬 (253) |
| 书目 .....          | (269)          |

### 费希特在中国

|                    |           |
|--------------------|-----------|
| 费希特在中国 .....       | 沈 真 (273) |
| 青年费希特的人际关系理论 ..... | 梁志学 (287) |
| 书目 .....           | (303)     |
| 编者后记 .....         | (304)     |

# 绪言：费希特的复兴

沈 真

1979年，各国费希特研究家纪念慕尼黑大学教授赖因哈德·劳特的会议论文集，取名为“先验哲学的复兴”。由于费希特是康德开创的先验哲学的完成者，于是人们便将当今国际费希特研究的蓬勃发展称为“费希特的复兴”。

正像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一样，费希特的复兴也有其历史背景和这种背景所决定的独特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符合时代要求的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一方面逐渐显示出了它的经济模式和法治模式的优越性，因而能以更加迅猛的速度走向全球化，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人们陷入了更加异化的境地：他们在身不由己的劳动中丧失了他们自己的自我；他们在物欲横流的生活丧失了走向极乐的方向。与此同时，错误理解的社会主义由于它所推行的那种尚未达到时代水平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并不能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民主，也同样使人民陷入了不能令人满意的境地，而这就促成了改革开放的课题的提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费希特关于弘扬自我，确立合理的主际性的理论，关于从感性世界观上升到哲学世界观，奔向清明的理想境界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法治社会的理论，就给

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哲学家们探讨现时代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许多启迪。

当然，费希特的复兴也是有其历史素材的。如果说，柏林科学院版《康德全集》的编纂工作曾经推动了“回到康德去”，那么，巴伐利亚科学院版《费希特全集》的编辑也给费希特的复兴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以这种坚实的文献工作为基础，各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家日益深入地探讨了费希特的先验哲学体系及其演变过程。不管他们所持的观点和得到的结论有什么不同，但如果加以概括，则可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许多可喜的丰硕成果。

第一，按照以往哲学史中盛行的观点，费希特仅仅是从康德过渡到黑格尔的一个中间环节，并无独立的体系可言。现今的研究已经彻底突破了这个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直线式模式，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一座宏伟的大厦，在它的途径曲折、关系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费希特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特的先验哲学体系，即知识学体系。这个先验体系不仅超越了康德的批判哲学，而且与后来的谢林和黑格尔的体系相比，也有其不可企及的方面，诸如理论哲学中的弘扬自我的原则，实践哲学中的坚持民主的原则。

第二，虽然有人在过去已经看到费希特晚期的思想变化，但从体系演变的高度来看，这一演变的真谛何在，他们的看法并不系统和详尽。与此不同，现代费希特研究家深入地探讨了早期知识学到晚期知识学的转化。如果说前者是以笛卡尔式的自我为最高原理的先验体系，后者则是以柏拉图式的理念——费希特称之为绝对、超时间的存在或上帝——为最高原理的先验体系。随着第一哲学的演变，各门哲学学科也相应地发生了

变化。如果说在早期宗教哲学中上帝作为主观东西的外化是使道德行为必然成功、不道德行为必然失败的最终保证，那么，在晚期宗教哲学中上帝作为创造万物的本原则已单纯变成了人们为超凡脱俗、怡享天福而追求的无限目标了。如果说在早期道德哲学中道德规律是从自我推导出来的，是对道德他律的彻底否定，那么，在晚期道德哲学中道德规律则是从作为上帝图像的概念推导出来的，实现道德规律的最高任务是在现实世界中创造出符合这种图像的道德秩序。如果说在早期法权哲学中法权规律是从作为自我的有限理性存在者推导出来的，他们按照法权规律自由地签订公民契约，推选国家官员，那么，在晚期法权哲学中法权规律作为一种由许多自我构成的外在关系则是从上帝的显现中推演出来的，国家官员已不再由全体公民选举出来，而是社会造就成的一种能在内心迸发出实现法权规律的意志的统治者。

第三，费希特研究家们对于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地位开展了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的研究。就他的思想来源而言，他们在探讨他与笛卡尔的关系、他与柏拉图的关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R. 劳特的《笛卡尔的哲学体系概念》（斯图加特 1998 年）和 W. 扬克的《费希特——存在与反思》（柏林 1970 年）。就费希特与他的同时代人的关系而言，他们不仅分别比过去更深入地比较了他的体系与康德、谢林、黑格尔的体系的关联与分歧，而且揭示了他与歌德、席勒、F. 施莱格尔、裴斯塔洛齐、雅可比等人的关系。就费希特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他们一方面在研究马克思对他的继承上取得了可喜成果，例如 M. 布尔的《费希特哲学与法国革命》（柏林 1965 年）、T. 洛克莫尔的《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

传统》(伦敦 1980 年), 另一方面开拓了对于费希特与胡塞尔的比较研究, 例如德国 H. 蒂特延的《费希特与胡塞尔》(法兰克福 1980 年), 而这是一项颇有发展前途的研究课题。

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 若干具备条件的国家相继成立了促进学术交流的协会。1984 年在广岛成立了日本费希特协会, 1987 年在联邦德国由 H. 季尔恩特组建了国际费希特协会, 1989 年由 R. 劳特组建了国际费希特研究协调会, 1991 年在匹茨堡成立了北美费希特协会, 1992 年在乌发成立了俄国费希特协会。这些学术组织大都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 并且拥有自己的刊物, 出版过会议论文集, 因而对推动费希特研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当然, 究竟有哪些成果成为公认的传世作品, 目前还难以预料。

费希特的复兴在当代各国的传播是与费希特著作的编辑与翻译相辅相成的。在德语国家, 除了上述《费希特全集》以外, 巴伐利亚科学院还编辑了《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六卷本, 斯图加特 1962—1992 年)、《同时代人书评中的费希特》(四卷本, 斯图加特 1995 年) 和《费希特晚期学术演讲集》(六卷本, 斯图加特 2000 年— )。与费希特哲学相关的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也在编辑和出版, 诸如 K. L. 赖因霍尔德、S. 迈蒙、F. H. 雅可比的著作。在非德语国家, 中国编译和出版了《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本, 北京 1990 年— ), 日本编译和出版了《费希特全集》(二十一卷本, 人间 1995 年— ), 俄国编译和出版了《费希特著作集》(三卷本, 莫斯科 1995 年— ); 美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在大量编译费希特的论著。

当然, 国际费希特研究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不平衡的。在德国费希特研究的推动和支持下, 法国、北美、意大利、日

本、中国和俄国的费希特研究进展较快，已经初具规模。在西班牙，费希特研究家 F. 恩森纳·考夫、C. 克虏茨和 B. 纳瓦劳都提供了重要的成果；尤其是波兰的 M. J. 泽迈克对先验哲学研究作出了不少出色的贡献。但在这两个国家里费希特研究尚有待于形成规模。最后，还有一些费希特研究家在他们的国家里虽在孤军奋战，但也同样有所成就。例如芬兰的 J. 马尼宁和保加利亚的 I. 斯特万。

鉴于费希特的复兴的这种情况，我们这本文集的编辑采取了这样的办法：第一，涉及的范围都是费希特研究已成规模的国家；第二，对每个国家的费希特研究的评介，尽量翻译本国哲学家写的报导，只有关于俄国研究费希特的报道是我们自己写的；第三，从每个国家都选译了一篇或两篇可供管中窥豹的文章；第四，所译的资料都是 1995 年前发表的，关于此后的进展，我们尽自己的所知作出补充。所译的报道与文章之后，有些写了补充说明，并全部附有费希特研究的书目，这些书目是参照 M. 鲍姆加特纳与 W. 雅可布斯编《费希特书目（1791—1968）》（斯图加特 1968 年）、雅可布斯续编《费希特书目》（1968—1993）（斯图加特 1993 年）和 D. 布雷齐尔编《费希特简报》（1—15 期），按出版年代编纂的，可供进一步研究时查考。

这本文集的编写计划是在 1986 年确定的。但编者只有在 2000 年完成了自己在费希特课题组里承担的其他任务之后，才可能着手这项工作。编者不敢懈怠，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从浩瀚的文献中编选了这些资料，有些补充说明也是根据这些资料写就的。编者曾赴俄国访问两次，才得以写出了那篇报道。假如不是受到某类人的阻挠，而能再访问几个国家的同

行，也许这本文集会编写得更丰满一些。如果读者能理解编者若干补充说明中介绍的治学之道，此书的问世也就达到了另一个目的。最后，还应该指出，本书是作为费希特课题组计划撰写的八本研究作品之一完成的。

## 回顾与展望

——1995 年那不勒斯国际费希特会议闭幕词

[德] R. 劳特

在这次那不勒斯会议的闭幕词中，我想回顾一下过去的国际费希特会议，与此同时，对费希特研究状况作若干基本说明。从奥地利茨威特尔的第一次会议（1977 年）到奥地利德意志堡会议（1987 年）和波兰莫吉拉尼讨论会（1989 年），直到现在的那不勒斯会议，中间经历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发展。我们当中的几个人，从茨威特尔会议开始，一直都是出席的，如 M. 布尔（柏林）、M. 泽迈克（华沙）、E. 伏克斯（慕尼黑）。你们试想一下，我们举行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会议，连当时所谓东方集团的研究者都参加了，这是多么不同寻常，多么让某些人震惊呵！我还记得，我的一位博士 G 先生<sup>①</sup>是怎样激烈地向我抱怨说，竟然共产党人也作为报告人出席。我在慕尼

---

① 劳特的学生 H. Girndt（1934 年生），现为杜伊斯堡大学教授。——译者

黑有时被骂作“共产党人”，也因为我过去（与这期间去世的H.雅柯布合作）作为惟一的西德人，同东德的一个官方机构签订了一项普通协定，它以对某些人来说不愉快的方式，被双方认真负责地履行了。从东西德费希特研究的重新崛起，直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这种研究的国际性发展，是一条宽广的道路。

我们当时的合作只能这样开始：我们坚决不介入东西德之间的相互指责，我们也始终不渝地坚持德国文化的统一性。由于一个机缘，我们在东德与M.布尔建立了持久的联系，他个人的态度与投入才使我们的共同事业成为可能。M.布尔也不断地同莫斯科的重要部门联系，并由此取得了费希特的手稿。这些手稿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费希特全集》的基础。例如，其中有普拉特纳讲演的部分手稿，我们在编者前言中注明，它们的藏书位置“目前不能标明”，这里的“能”应当从道德角度来理解。我们非常清楚它们在莫斯科的藏书位置，M.布尔给我们搞到了复印件，但我们不能说。

或者，另外一个例子：我们觉得有关的几封康德的信，是从当时苏联的巴尔特库姆（Baltkum）来的，但是却放在东德，而东德不希望提到它们当时的地点。你们发现在我们出版的费希特作品中有一封康德的信，这封信的文体我对照《康德全集》（柏林科学院版）修订过。如果有人问我，我是根据原件修订的呢，还是仅仅出自我的想像，那我就不能回答他。

然而，我们与东方的费希特研究者的合作仍在继续。极其幸运，沈真教授——梁志学教授的夫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俄罗斯哲学的女教授——访问了莫斯科，在北京与莫斯科的费希特研究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他们的相互接触就像他们同我们的接触一样，已经有八年了。另一方面，M.布尔和我多次来

到莫斯科，在那里，我们首先同 N. 葛罗米柯女士，同阿尔谢尼·古留加教授与伊斯科拉教授夫妇建立了学术联系。这样就出现了北京——莫斯科——柏林——慕尼黑之间的四角联系，它使我们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成效。

这种联系在当时并不像今天被看作理所当然地可能的那样，是可以思议的。它的建立超乎寻常地困难。决定性的前提是，我们大家都懂得齐心协力，避免让政府当局就此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

M. 布尔报道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俩在哲学上是怎样相互协作的。我也许可以算作自己功劳的是，我能在战后第一次将一位研究费希特哲学的教授从中国带往日本。他就是梁志学先生，他在东京的同行们面前作了一个报告。根据梁先生的建议，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了日本的费希特研究者隈元忠敬教授（广岛）和隈元泰弘博士（大阪）前往北京作关于费希特的演讲。

这仅仅是 70 年代末以来，费希特研究在全世界发展的通路上若干特别光辉的事件。让这些事件卓然可见，是我们今日会议的目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某种极其有趣的现象：不是美国，不是英国或法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着手将费希特的著作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种情况在日本是靠私人发动的，日本政府认为这种著作的编译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对伟大的古典哲学的兴趣强烈得多，国家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五人编辑小组。从此开始，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求学者来到慕尼黑，在这里，他们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并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远东对哲学理解的前提。当 M. 布尔说，他和我对中国现在正在繁荣的德国古典哲学研

究产生了影响时，他并没有夸张。在这一点上，我们总是以杰出的方式进行着合作。

在这方面，M. 泽迈克的活动也应当引起注意。就在波兰和德国充满深刻敌意，并在二战后继续抱有这种敌意的时候，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著名的波兰哲学家竟向我们走来，把康德与费希特确立的先验哲学当成了他的立场的基础。这一参与的光辉结果便是由他带给我们的《莫吉拉尼国际费希特会议论文集》（华沙 1995 年）。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费希特研究展现出一个特殊的领域。这儿，我必须首先提到 J. 马尼宁（奥鲁），他本来在本周应当出现在我们中间。在芬兰就像在挪威（如 E. 斯笃海姆教授），人们也紧张地忙于研究那些在费希特那里学习过并部分地独立发挥了费希特哲学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如施泰芬斯、荷耶尔、奥斯忒、欧仁施莱格尔、柏林克曼等。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就像这种由于地区关系很少流行的语言一样，没有被充分注意到。因此，若干年前成立了“欧洲哲学与思想史协会”，我们当中的若干人就属于该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的特殊使命是向主导性的语言世界传播这些研究成果。

费希特研究在法国、意大利与美国的进展状况，除了我这儿必须对此多说的以外，你们是应当了解的。特别在意大利，对费希特与一般德国古典哲学的热烈研究导致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是美国的费希特研究，虽然开始较晚，但现在也进展甚快，这首先要归功于 D. 布雷齐尔（列克星敦）和 T. 洛克莫尔（匹茨堡）。

对我们来说，同先前一样，伊斯兰国家的研究情况令人担忧。正如我从我的两位学生——他们是那里的教授——得知

的，在那里维护先验哲学不是没有危险。就连最早开放的国家，例如埃及，也因为太穷而根本不能资助费希特研究。富裕的首长国则对此感到厌恶或干脆抱有敌意。因此，穆斯林世界的整个地区在我们的哲学探讨方面都是空白。既然哲学就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并不必然排除原教旨主义，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非常遗憾的。

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请让我对未来的任务说几句。我们有一点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我看很重要——，即在费希特研究方面，我们即使在将来也不能寄希望于数量方面的巨大突破。费希特哲学是极其深刻和极其复杂的，因而也就远非那种接近常识的方便哲学。它试图把握现实的整个系统结构，因此，它要求每个想要研究它的人，需要经过比研究另一种哲学长得多的时间去学会理解与判断。请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种情况。德意志研究协会在 60 年代试图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费希特全集要像黑格尔全集一样，由一些每隔 6 年就要调换出去的合作者从事工作。你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的话，事情的结果会有怎样的缺点。我当时意识到，我们大家一生都得与相关的材料打交道。除了《费希特全集》的编辑外，费希特的研究情况也一样。但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指望数量方面的巨大突破。

然而，这种研究也包含着克服这种缺点的解救办法。这样一种伟大的系统哲学会吸引杰出的人士研究它，我指的是法国的 X. 里昂、M. 盖鲁、A. 费洛年柯，意大利的 L. 帕雷松和 C. 切萨，俄罗斯的 B. 维舍斯拉夫采夫和 G. 古尔维奇以及其他。我很荣幸曾是这些人当中某些人的朋友，尽管存在的学派对立本来会使此事常常成为不可能。梁志学教授由于他在中国公众

中作为费希特著作的编辑者与解释者发挥的影响，当然也属于这些人之列。我们必须期望，这类杰出人物将来也会被费希特的知识与问题所吸引，以致他们的卓越成就就会抵消数量方面的缺陷。

以上提到的费希特研究者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杰出的解释者，因为他们依靠深入系统的洞察，提出了关于系统的先验哲学的全面观点与全面解释。因此，他们避免了一种恰恰对于像费希特这样全面的哲学所构成的极其巨大的危险，即避免了坐井观天的危险，而这种结局必然意味着脱离整个体系。

难道人们不曾试图从费希特学说中得到一切！很遗憾，这句话在这里仍然有效：*Corruptio optimi pessima* [最糟糕的是精英的腐败]。使人这样坐井观天的原因之一是世界观的偏见。比如，我们从 G. 策勒尔先生（依阿华）的报告中就可以得知，这一点当时在英国是怎样产生影响的。我们可以并且必须遗憾地将这种思想的片面化永记在案，我们将来可不要重蹈覆辙。

我们的使命是科学地把握先验哲学的系统，而不是在世界观方面随波逐流。在此，我想把被割裂开的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提出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尽自己的所能，科学地研究费希特，并且在我们取得了像里昂、帕雷松和维舍斯拉夫采夫那样引人注目的成果时，我们将很荣幸，但我们的工作范围也仅限于此”，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就完全错了。这种错误定位的危险今天在年轻的研究者那里是很大的。

不，这里的关键点——这一点昨天还使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有点吃惊——在于：我们要让这种认识实际上成为有效，并且成为直接有效。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 A. G. 马雷托（那不勒斯），他使本次大会与其他许多活动成为

可能，他不是为了让这个大厅回音缭绕，让哲学论著方面的出版物堆积如山；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一点，是为了使社会产生一种变革。当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首先也是朝这一方面努力的，在那里，费希特哲学关系到社会未来的话题被公开地讨论。

中国从30年代以来的发展表明，人们不能让社会只听凭经验方面的摸索，而是必须立足于整个系统的构想。但这种发展也表明，一种体系可能包含的思维失误（我这儿首先指的是黑格尔的体系，因为它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基础），必然导致政治生活中的错误结局。我只举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黑格尔称为“最高伦理”（即国家或政治——译者）的东西与道德的错误分离在共产主义中引向了一种信念与实践，即对党的忠诚可以使任何一种道德上的豁免合法化。每一个恶行只要有益于实现最高的伦理价值，都被合法化。众所周知，这一点首先是针对非共产主义者而实行的，但自从斯大林掌权以来，也用来反对那些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里有偏离的人，结果便是人所共知的“巨大恐怖”。如果一种哲学的整个系统正确，它就必定会在现实中验证不爽。但如果它完全不付诸行动，那么，要依靠部分经验结果继续进行摸索，更为确定的前景便是最终的自我摧毁。于是，哲学就只呆在象牙塔里，只玩弄一些不承担义务的玻璃球游戏。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知识而非理性的发泄，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实行全面的强制。

然而，在对那种按先验观点规定现实的体系的科学理解范围内，也一直潜伏着片面化的危险。按照费希特的思想，有五个系统的基本观点，即自然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宗教